

冷战伊始，发生在勃兰登堡门两侧的那场东西方危机对抗，

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封锁与反封锁是其鲜明的特点，

核威慑、空运与外交谈判，

则构成了“山姆大叔”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词。

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rst Berlin Crisis

杨 捷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rst Berlin Crisis

杨捷◎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杨捷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210-04903-6

I. ①美... II. ①杨...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324 号

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

作者:杨捷

责任编辑:蒲浩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901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sh.com

E-mail:taxue888@foxmail.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210-04903-6

赣版权登字—01—2011—2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5.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印刷九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发生在 1948 年夏 - 1949 年夏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双方在欧洲核心地带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抗。从双方没有大规模使用热兵器的角度看,这场冲突是“冷”的,然而从美国大规模使用飞机,大量燃烧航空汽油的角度看,这场对抗又不太冷。在危机的高峰时期,西部柏林的坦伯尔霍夫机场,不论天气好坏,不分白天黑夜,每 20 分钟就有一批四引擎的大型飞机降落,运送包括煤炭在内的生活物资,日空运量达到 8000 吨。在长达 11 个月的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共出动 19.5 万余次飞行航班,运送了 140 余万吨生活物资,空运费高达 2.5 亿美元。然而,并不低碳的“热”并未催生出武器的发射,令人惊心动魄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终究还是保持了冷战的特性。第一次柏林危机不仅是冷战大规模对抗的开端,同时也奠定了冷战的“战”而不“热”的基本特质。

尽管从对抗双方的基本意愿来看,双方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为

此打一场欧洲热战,刚刚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煎熬的民众也不希望再次卷入热战的漩涡。然而,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的事件,并非只有成为现实的那一种走向。在人类社会,令人震惊的事件比比皆是。这些事件之所以令人震惊,有不少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走出了一条较为诡异的轨迹,脱离了当事人的原初选择方案,也在没有摆脱主客观条件制约的前提下出现了最不理想的结果。然而,第一次柏林危机没有出现这种结果,它还是停留在“冷战”的基本范畴之内。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当事双方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以美方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决策者、决策机构和国家间关系层面,对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决策作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这次危机真相的全面理解。

本书作者杨捷博士,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型。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反映出作者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文章框架合理,文字老道,表现出高于实际年龄的成熟。然而,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材料的搜集方面,优势不太明显。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后,我校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各种优越条件为其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里不仅有购自国外的原始档案文献拷贝件,更重要是具有良好的研究氛围:学者和研究生都孜孜追求文献的原始性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国外一流学者的经常性对话与沟通,不仅保持着研究水平的前沿性,而且由于能够使用中方档案资料而体现出一定程度的领先性。在这里,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料本身以及下载资料的路径。杨捷尽管没有直接进入研究中心,但在良好氛围的浸淫下,开始实现转型。这本书,就是转型的产物。作者依靠研究中心的有利条件,多方搜寻资料,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翻译和筛选,按照事件发生的逻辑,对相关资料作出筛选和编排,从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的初步反应、美国基本应对政策的形成、美国决策的实施与调整、美国与危机的结局等不同阶段作了详细的叙述,最后,还从美国国内的政治机构层面、美国国家行为体层面对美国的决策影响因素及特点,以及

美国的危机决策成效,作了带有理论色彩的总结。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同它的优点有一定的关联。由于作者过于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运用和事件探索的深度,对于美方决策同法国等盟国的互动,甚至与对手苏联方面的互动关系,挖掘得略有欠缺,而这,本来是攻读硕士学位阶段杨捷的长处。作者在这方面,生动地演绎出人才成长的曲折轨迹。

郑寅达

2011年12月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危机(Crisis)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医学里,意思是关系生死的转折点,指病人的身体处于一种要么开始康复,要么开始进一步恶化直到死去。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来形容人和人的关系或国与国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关头。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走向战争或和平的转折关头,导致危机的冲突要是得不到解决,就会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① 格伦·斯奈德认为,危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潜在因素,“如权力结构、利益、意象、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22页注释。

联盟等因素逐渐变得清晰可辨,并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上活跃起来”。^① 因此,研究国际危机是透视国际政治内涵的重要路径。

发生在 1948—1949 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也称“柏林封锁事件”),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首次面对面的对抗。危机非但没能阻止德国的分裂,反而成了造就 20 世纪两德并立现象的里程碑事件,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一直困扰东西方大国的“西柏林地位问题”由此而发。对研究战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来说,探索第一次柏林危机也有重要意义。这场危机因以美苏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利益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最终左右了德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危机的遗留问题诱发了战后德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如 1953 年的“东柏林起义”、1961 年的“柏林墙事件”等。更加重要的是,与危机密切相关的西方筹建西德国家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战后德国的实际分裂,构成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带来的“两德问题”影响着 20 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研讨这次危机有助于人们从源头上考察战后德意志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有助于对战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专注于国际危机研究的理查德·内德·勒博认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分类上属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起的挑战,迫使其从某一重要的承诺中后退”^②。美国学者菲利普斯·戴维斯和俄罗斯学者纳林斯基都曾明确指出: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力图确保凭实力就德国问题与西方大国进行谈判,他早就料到柏林局势的复杂化会迫使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作出让步,放弃建立西部德意志国家的计划;如果西方国家不准备就德国问题作重大政治让步,那么苏联领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 631 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 632 页。

领导人就要把他们从柏林赶出去,把整个城市归入苏占区。^① 中国学者张盛发也在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论断。^② 不过,危机的结果却与苏联的初衷截然相反,西德国家在危机结束后仅半年就已然建立,同时西方也通过空运等方式稳固了自身在西柏林的地位。苏联的行动目标之所以无法实现,西方阵营的领袖——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的对德政策与美苏关系的演变相伴相生。二战后期美国对德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予以严惩,但随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终结、东西方对抗的加剧,尤其是冷战的爆发,对苏进行遏制以阻止其势力在欧洲的蔓延,逐渐成为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德国重要战略地位、工业潜力以及在历史上长期充当的欧洲力量平衡者的角色,使美国在冷战背景下逐渐转变对德政策,开始扶持德国并决心将其纳入西方势力范围,作为遏制苏联的重要砝码。美国对柏林问题的政策从属于整个对德政策、服从于欧洲冷战战略的全局,因此考察美国如何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也是认识冷战爆发后美国对德政策和欧洲战略的重要途径。

具体到危机事件中美国的政策和行为,同样有着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美国为什么会在苏联近乎于战争威胁的压力下依然坚守柏林?他们是如何看待苏联的封锁行动和相关要求,又是怎样作出决策的?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军事力量又在美国的危机应对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美国是如何在战与和之间做出选择的?哪些主要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决策?美国在从危机走向和解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研究上述问题,不仅可以解释危机的发展轨迹,也有助于

① 米哈伊尔·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苏联档案新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М. М. 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又见 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A Study in Cold War Politics*, Princeton, 1958, p. XI.

② 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及其论文《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

认识“冷战自我控制”的东西方关系特点,感悟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实质。

此外,深入探究这场危机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的研究大有裨益。国际政治学家格伦·施奈德把危机称为“微观的国际政治”,他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都可以在危机中得到集中反映。除了冲突之外,这些问题还包括讨价还价、谈判、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危机升级和缓和、威慑、不同的权利结构、利益、价值观、观念、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运用(或不运用)、外交和决策,等等。第一次柏林危机恰恰包含了上述绝大多数内容,因而以此为个案加以深入剖析,可以从历史实证的角度验证和丰富国际关系中的危机思想与理论。鉴于对整个危机事件来说,本书的研究视角是美国的应对决策及行为,所以论述的史实与外交决策学理论的关联较为紧密,通过对典型历史事件的分析,既可以更为直观地领悟理论的内涵,也能够充分彰显理论的现实魅力,这或许就是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菲利普斯·戴维森于1958年出版的《柏林封锁:冷战政治研究》^①,是首部系统、完整地研究第一次柏林危机的英文专著。该书从冷战政治、大国对抗的角度出发对危机事件展开详细的论述。作者将危机置于大国对整个德国战略争夺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在分析说理时大量列举和采用了对相关人物的采访和媒体报道。戴维森认为苏联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不冒战争危险的范围内,莫斯科将外交行动与大量的群众、宣传运动相结合,但却始终没有把国际谈判作为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对于西

^① 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A Study in Cold War Politics*, Princeton, 1958.

方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戴维森则认为它们的危机对策缺乏必要的计划,甚至是模糊不清和犹豫不决的。尽管该书就危机事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部专著也存在着很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以至于书中的诸多论述和推断在今天看来缺乏说服力、有失偏颇、甚至是值得质疑的。首先,由于该书问世的时期正处于冷战中大国紧张对峙的阶段,当时的西方学界对“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正是“传统学派”大行其道之时,作者的论述也深受这些因素的左右。例如戴维森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苏联,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苏联挑动是非、西方被动回应的思想理念;在分析危机的结局及其原因时,作者所提出的也是典型的“西方获胜论”,并以此将危机定位成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次,该书的出版和危机事件从时间上仅仅间隔十年,绝大多数有关危机的国家政府档案材料尚未解密,这使得书中在对众多问题和细节的说理与论证上缺乏有力的证据,也直接导致作者在大国的危机对策和危机外交的内容上着墨甚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危机事件的认识。

马克思·查尔斯于1959年出版的《柏林封锁》^①以及罗伯特·罗德里格在1960年出版《柏林空运》^②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专著。前者突出了对危机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和问题的论述,例如“撞机事件”、“柏林黑市问题”、“热气球问题”等,这些构成了以具体事件和问题发展为逻辑的论述手法。后者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研究性论著,作者在书中大量采用了近似于文学描述性的语言。主要通过对柏林空运当事人和见证者的采访和回忆记录记叙了危机期间的空运进程。此外,理查德·考利尔在1978年出版的《跨越空

① Max Charles, *Berlin Blockade*. London, 1959.

② Robert Rodrigo, *Berlin Airlift*, London: Cassell, 1960.

中的桥梁:柏林封锁与空运(1948—1949)》^①也以人物为中心对危机事件进行了叙述。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上至各国政府要员、军政长官,下至各阶层普通百姓甚至是家庭妇女,通过记叙这些人在危机中的行为和感受反映危机事件的国家性和社会性。同年问世的丹尼尔·尼尔森的《柏林困境的战时起源》^②则是溯源第一次柏林危机起因的上乘之作。作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对柏林问题的讨论为主线,论述了1944年到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大国在管制柏林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通过对大国行为的分析,探究这些外交活动及其结果与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内在关联。英国学者马克·阿诺德-福斯特在1979年出版的著作《围困柏林》^③中,考察了柏林城从1945年5月被苏联攻占到60年代初“柏林墙”出现之间,市政状况的历史演变。该书共分三个部分,其中占据一半篇幅的第二部分,论述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的柏林城。

此外,国外代表性的文章包括:辛普森的《柏林:盟国的权利以及对城市分裂的责任》^④,杰瑟普的《穿过黑暗的道路:结束柏林封锁的外交》^⑤,斯蒂芬·沃克尔的《在柏林的讨价还价:对第一次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再认识》^⑥,西奥多·拉斐尔的《综合的复杂性理论与

① Richard Collier, *Bridge Across the Sky: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Airlift 1948 - 1949*,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78.

② Daniel J. Nelson, *Wartime Origins of the Berlin Dilem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

③ Mark Arnold-Forster, *The Siege of Berlin*, London, 1979.

④ J. L. Simpson, "Berlin: Allie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Divided City,"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 No. 1, (Jan. 1957) pp. 83 - 102.

⑤ Philip C. Jessup, "Dark Avenue: Diplomacy Ending the Berlin Blockad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7, No. 3 (Sep. 1972) pp. 377 - 400.

⑥ Stephen G. Walker, "Bargaining over Berlin: A Re-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Berlin Cris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4, No. 1 (Feb. 1982) pp. 152 - 164.

国际危机预测:柏林 1946—1962》^①,克里斯托夫·艾格尔的《柏林:分裂的遗产和统一问题》^②,查尔斯·蓬纳基奥的《东德共产党与柏林封锁危机的起源》^③以及威廉·斯迪沃斯的《不彻底的封锁:苏占区对西柏林的供应》^④等。

尽管国外研究第一次柏林危机本身的论著不少,但专门研究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关系的论著则是凤毛麟角。值得介绍的是英国学者艾维·施莱姆于 1983 年出版的《美国与柏林封锁(1948—1949):冷战决策研究》^⑤。身为牛津大学教授的施莱姆虽是知名中东问题专家,但他在欧洲问题和美国外交的研究上同样很有造诣。该书的一大特点是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历史个案探究美国冷战外交决策的机理性因素。施莱姆通过决策者行为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美国政府内部处于不同政治地位、扮演不同政治角色的个人对危机的不同认知及其动因。该书参考了 20 世纪 70 年代解密的美方官方文件档案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其史料相对扎实但也并非没有缺憾。首先,尽管施莱姆在篇章编排上大致遵循时间顺序,但由于其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学的研究模式,因而在相关史实及其内在逻辑的考察上有所欠缺;其次,该书在对外交决策单位的分析关注的重点是决策者个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危机期间美国整体对策的认识;再者,该书在讨论美国决策内在机理的同时,对影

① Theodore D. Raphael, "Integrative Complexity Theory and Forecas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Berlin 1946 - 1962,"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6, No. 3 (Sep. 1982), pp. 423 - 450.

② Christof Ellger, "Berlin: Legacies of Division and Problems of Unificat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58, No. 1 (Mar. 1992), pp. 40 - 46.

③ Charles F. Pennacchio, "The East German Communis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erlin Blockade Crisi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29 No. 3, (Fall 1995).

④ William Stivers, "The Incomplete Blockade: Soviet Zone Supply of West Berl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Issue. 4, (Fall 1997), pp. 569 - 602.

⑤ 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 - 1949: A Study in Crisis Decision-mak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响决策的外部因素,例如盟国等问题的研究上涉猎较少;最后,由于该书的成文时间较早,因此无法使用近年来陆续公开的部分新的文献档案。这些缺憾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问世的托马斯·帕里什的《均势中的柏林(1945—1949):封锁、空运和冷战中的第一次主要对抗》^①,迈克尔·D.海道克的《围困中的城市:柏林封锁和空运(1948—1949)》^②以及罗格·G.米勒的《拯救城市:柏林空运(1948—1949)》^③,虽然也都在论述中涉及了美国与危机的关系或者美国对危机的应对,但这些内容都只是以上三本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分析深度上尚有欠缺。帕里什的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大国,在德国问题上矛盾冲突的激化;第二部分考察了危机形成后,美国等西方大国与苏联之间以封锁和反封锁对抗为特征的行为互动。海道克在书中也重点展现了危机进程中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封锁”与“空运”的对抗性较量,对危机期间大国的外交活动论述较少。米勒在考察危机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对美国和英国的空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作了详尽分析。这三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倾向于军事史或空运史的研究,但对危机中的美国的外交决策论述较少。尽管空运是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但危机最终没有演变为战争,从根本上说依然是谈判、交涉等外交活动起了关键作用,这也正是上述三本著作存在的不足之处。

此外,有关美国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政策的论述还散见于一些有关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或占领管制的著作中。如W.施密瑟的

① 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 - 1949: The Blockade, the Airlift, the First Major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ddison-Wesley, 1998.

② 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Airlift 1948 - 1949*, Batsford Brassey, 1999.

③ Roger G. Miller, *To Save a 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 - 1949*,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从雅尔塔到柏林:围绕德国的冷战争斗》^①,尤金·戴维森的《德国的重生:对美国占领的总结》^②,爱德华·彼得森的《荣归:美国对德国的占领》^③,理查德·梅里特的《强加的民主:美国的占领政策和德国民众(1945—1949)》^④,卡罗琳·伍兹·艾森贝格的《划界:美国分裂德国的决策(1944—1949)》^⑤,哈罗德·兹克的《美国在德国(1944—1955)》^⑥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将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美国对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事件之一,大多将美国的危机对策作为实践长期对德政策的一个环节或部分,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而没有就危机对策的成因等问题作深入分析。由于核武器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介入,在一些有关美国原子政策研究的著作中也对危机事件有所涉及。如乔治·邦迪的《危险和生存:近五十年来在原子武器上的决策》^⑦,提摩太·波蒂的《漫长的等待:锻造美英原子联盟(1945—1958)》^⑧等。但这些论著大多将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美国实践核政策的一个事例,并没有对美国在危机中的核政策展开阐述。

国内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差距,专门的

① W.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1999.

② Eugene Davidson, *The Death and Life of Germany: An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New York, 1959.

③ Edward N. Peterson, *Retreat to Victor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Germa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Richard L. Merritt, *Democracy Imposed: U. S. Occupation Policy and the German Public 1945 - 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Carolyn Woods Eisenberg, *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1944 - 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⑥ Harold Zink, *The United States in Germany 1944 - 1955*, New York, 1957.

⑦ 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1988.

⑧ Timothy J. Botti, *The Long Wait: The Forging of Anglo-American Nuclear Alliance 1945 - 1958*, New York, 1987.

研究性著作尚付阙如,只是在部分通史书籍中有概括性的叙述。如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方连庆、王炳元主编的《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中的第一编第四分册(1948年),用万余字的篇幅对这场危机的历史过程做了描述,并引用了部分美国解密外交文件和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但由于篇幅所限,《长编》的内容基本处于对事件的一般性描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大国政策的分析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此外,国内的其他论著中也有部分章节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了简要论述。例如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金质的《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吴友法的《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具有代表性的是张盛发的《斯大林与冷战》,该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从苏联角度对危机事件的缘起和结果进行论述,并引用了来源于俄罗斯杂志《近现代史》所选刊的解密苏联政府文件,对后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国内目前的相关论文也比较有限,如张盛发的《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①、刘馥的《论柏林危机(1948—1961)与冷战初期的德美关系》(《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刘凤艳的《美国应对柏林封锁空运政策的讨论及决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增刊第2号)、刘志青的《三次交通封锁与第一次柏林危机》(《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

综上所述,国外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经历了从历史叙述到专题分析的过程;在研究材料上也经过了从使用报刊、杂志到逐步使用解密政府文献的过程;在研究思想上也逐步从冷战时期的宣扬“西方胜利论”回归相对平和地看待历史事件。但研究角度也随着

^① 该论文的内容、观点和作者在《斯大林与冷战》一书中相关章节的论述大体一致。

相关政府文件的解密和其他文献的发掘而逐渐趋向多元化,但也存在着一些缺憾。例如尽管近年来对空运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仍无法走出从军事史角度考察问题的局限,缺乏外交史层面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既有成果对大国内部危机决策的研究有待深入,对危机中大国政策互动的探讨则更多的是针对东西方关系的分析,鲜有对西方盟国内部政策互动的关注。此外,国内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相对滞后,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存在不足,尤其是缺乏相关的学术专著。

三、研究思路 and 任务

鉴于国内外既有学术成果的上述特点,本书将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冷战为背景,以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为主线,在复原历史事件客观进程的基础上,着力围绕着美国的危机决策展开研究。

笔者认为,从大国关系的层面上讲,美国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中主要存在着两个政策向度:一则是针对苏联政策和行为的反应与交涉;二则是在此基础上,协调与同为危机受动者的英法盟友的对策步调。这就犹如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决定事物的性质,但次要方面也会对整个矛盾体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故而本书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两个关系层面:一方面主要研究美国内部对危机的反应和决策,关注的行为体主要包括总统、国务院、军方等在内的美国政府决策层,以及包括驻德军政府、驻外使馆在内的派出机构等,论述他们在危机进程中各自态度、立场和主张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注意分析影响美国危机决策的外部盟国因素,对此笔者将着力考察英国因素的影响,分析英国应对危机策略与美国的危机决策之间的互动性,而这一点也正是以往国内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过,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大型档案汇编《英国海外事务文件集》中,收录了为数不少的有关英国在第一次